

## “書籍之路”上的文明傳播——評王勇《東亞文化環流十講》，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

金鏞鎮  
上海外國語大學

王勇的《東亞文化環流十講》一書，基於“以中國文化為源頭、文明共存為理念、比較研究為方法”的研究思路，以新穎的視角、豐贍的史料，追述東亞文化發源、傳承、流播、變異、融合、再生的軌跡。

該書以廣闊視野俯視東亞各國，形成了中國、朝鮮半島、日本列島文化傳播的線路，並在此基礎上論及越南等南亞，以及絲綢之路所覆蓋的西亞。從藝術、血緣人種、典籍、漢文學、佛教等一般意義上的文化形態，延展至流通於東亞各地的文化意象、筆談文獻等諸多要素，從不同的角度與切入點進行了多維立體空間的考證。

作者在該書中提到的最重要的關鍵點在於對“文化東亞”的闡述。在這一點上，他不僅構建了一種獨到的理論框架，並用豐富的案例來證明了他的觀點。案例中包括對物質傳輸、技術革命，還有精神上的傳播，其中，作者認為最為重要的則是對內心世界的連動。從東亞的視角來說，占據首位的還是精神上的傳播，其中“書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 一、“文化疆域”——界定與內涵

該書在理論上有所創新即是提出了關於什麼是“文化疆域”的概念，它是指一種領先周邊的、高度發達的、具有權威的、占據主流的文化，超越民族、宗教、國界向四周瀰漫擴散，在其影響所及的區域形成一個中心，但沒有明晰的邊界。突破以國為界的研究套路，論述以中國為源頭的物質文明、技術文明、精神文明對周邊地區的多層次輻射，建構“源頭”“中心”“周緣”諸要素互動的文化同質圈。尤其是論述“東亞傳統文化爭奪戰”時所云“文化源頭與生俱來，文化中心靠後天爭取”，令人印象深刻。該書不僅構築了一個古代東亞文明流播的理論模式，還揭示了東亞諸民族、各地區之間人員往來與交流的規律途徑。

作者強調，從東亞文化交流的千餘年歷史來看，除了大家耳熟能詳的漢字文化圈、儒教文化圈、漢譯佛教圈等，還可以舉出中國文化自秦漢以來，傳播周邊、恩澤四鄰，形成一個持續而穩定的文化共同體。漢代，把絲綢、紡織、農耕、金屬、陶瓷等技術與產品推廣到周邊地區甚至遙遠的西方。唐代，通過傳播典章制度、宗教信仰、儒教倫理、天文地理、建築園林、繪畫書法、音樂舞蹈等，極大地提升了周邊國家的文明程度與知識水準。

之後，又經歷了千餘年的滄桑變遷，雖然宋元明清各朝各代，在某些局部均有超越前代或開創新局的成就，如宋代的禪宗、朱子學、印刷術，明代的醫學、航海術、白話小說等，起到了充實、加固、擴展傳統文化疆域的作用，但沒有一個朝代能從根本上取代唐朝的影響力。

這些東西都曾走出國門傳揚四方，形成一個又一個的“圈”，這

些“圈圈”重疊起來就形成了文化的疆域。大概世界上沒有人否認，東亞傳統文化中的主要元素，都是從中國源源不斷地流向周邊國家的，因此，東亞文化疆域的源頭在中國，這是鐵定的事實，不用去懷疑。

## 二、“物質與技術文明”——傳播與變異

該書寫道，從陶瓷、絲綢、貨幣、服飾等物質傳播與生產技術的角度看來，很多都是從中國向周邊擴散的。高度發達的中國藝術頃刻間席卷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很快顛覆了周圍東亞各國的原始傳統，其藝術從封閉走向開放，匯入了新的生機，並各自百花齊放，出現了東亞藝術的環流盛景。

作者認為，絢麗燦爛的舶來藝術令人傾倒，鄰邦熱衷於對中國藝術的追隨和模仿，從而在東亞藝術的發展進程中出現了重大轉折。一種文化在傳承和流播過程中，必定會發生種種變異，在此意義上，模仿藝術並不是對母體的單純複製，由於主體和時空的轉換，形狀也許會走樣，功能未必就雷同。這種藝術的模仿應該看作是藝術的再創造活動。

作者提到，以中國為源頭的文明傳播來說，起到基礎影響的是物質文明，它改變了接受者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技術文明則影響比較大一些，它改變了接受者的生活方式，乃至生產方式與力量。

在本書中，他詳細地例舉了幾種物質與技術的傳播途徑，包括：韓國出土的，夾雜着大量銅鏡、毛筆、五銖錢、刀子等文物一起發現的公元前一世紀前後的扇子；日本古墳中發現的神獸鏡，雖其形體、紋樣、銘文皆有異於中國出土的銅鏡，但也是中國的變種；日本遣唐使模仿長安城建造藤原京；日本仿造“開元通寶”制作“和同開寶”，

日本學習唐朝的《永徽律令》頒布《飛鳥淨禦原令》《大寶律令》；日本的裁縫技術是中國南北時期江南的“吳女”所傳授的，遣唐使們穿着帶有唐朝風格品位的服飾還鄉，引發日本對唐服的熱潮，促使它在唐風影響下大幅度改良；螺鈿工藝起源於中國，盛唐時傳播於四鄰、日本經過模仿和改良；此外，日本從唐繪中衍生出大和繪，從漢字書法中變化出假名書法；花道、茶道、金碧障屏畫、繪卷物、書院建築樣式、假面具等和風藝術也異彩紛呈，逐漸使日本藝術趨向定型。

在整本書中最關鍵的話題，是有關“絲綢之路”的敘述。作者指出，蠶桑不僅僅是一種生產技術，也是凝聚着中華民族智慧的文明載體。自從漢武帝時張騫鑿空西域，開拓了貫通東西方的絲綢之路，“絲綢”便源源不斷地傳播到西方。古羅馬人基於牧民的思維，堅信這些神奇的紡織品，其原料采集自長滿羊毛的樹木，虛構出所謂的“羊毛樹”傳說。當西方人堅信絲綢是從“羊毛樹”上采集而來時，中國的養蠶、植桑、抽絲、紡織技術傳播到東亞各國。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均能量產絲綢，有些具有本土特色的絲綢還回傳到中國，充實了絲綢文化的內涵。隋唐時期中國書籍大量傳播到海外，更是熏陶了周邊民族的心靈。

作者在書中提到了有關物質文明與技術文明的域外傳播與變異，但一方面向讀者拋出了更為尖銳的話題。他質疑道，位於今甘肅省敦煌市西南的陽關，曆來是中國通往西域的咽喉之地，是絲綢之路南路必經的關隘，但為什麼大量的、頻繁的“絲綢”交易並沒有形成文化共享的局面呢？為什麼“絲綢”這種商貿物品，雖然走出了國門，但沒有擴展其文化疆域呢？

對此問題，作者做了解釋，以“絲綢”為代表的物質文明，能給其他文明增添異國色彩，但無法從根本上影響其文明的形態；以“蠶

桑”為代表的技術文明，能促進周邊民族的生產力發展，但無法重塑人們的內心世界；唯有凝聚着中華民族理念、智慧、知識的書籍，猶如文明的種子播撒到周邊國家，在異國他鄉生根發芽，雖然不免出現種種變異，但中國文化的遺傳基因始終傳遞着古老的信息。這些源源不斷從源頭輸送至周邊的DNA，便是文化疆域的生命源泉和靈魂。

### 三、“精神文明”——源頭與中心

本書抓住東亞傳統文化中的漢字、漢文典籍、工藝、佛教等主要元素，分析其生成之“源頭”和環流、發展之後形成的“中心”，以及各中心之間的關係，探討了東亞世界話語體系和話語權的問題。

那麼，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到底是什麼？通過什麼方法建構起一片唐風熏染的文化疆域呢？作者概括地說，這既不是唐朝靠武力征服獲取的，也不是靠絲綢貿易等經濟手段開拓的，而是因為博大精深的中國精神徹底改變了周圍的文明景觀。

我們可以根據東亞共用的“漢字”稱之為“漢字文化圈”，亦可以根據其共有的“儒學”稱之為“儒家文化圈”，還有通過漢譯“佛學”在東亞傳播的“佛教圈”等。隋唐時代，高句麗、新羅、百濟以及日本、越南等普遍使用漢字，知識階層具有較高的漢文閱讀、寫作能力，因而中國的書籍成為周邊國家攝取先進文化的主要媒介。也就是說，盛唐通過書籍、文字、律令體制掌握了東亞的話語權，建構了東亞的價值觀、學術和概念體系。

然而，真正對東亞地區產生持續而深遠影響的，應該是“書籍”。如果說東西方之間存在一條以絲綢產品為象征的“絲綢之路”，那麼

東亞各國之間則存在一條以漢文書籍為標志的“書籍之路”。因典籍的留存形式而具有長期的保存性與延續性、滲透力與拓展力，進而對文化輸入國精神層面的影響力難以估量。作者在 20 多年前最早提出“書籍之路”的概念，當時國內外主流媒體均有較大反響。

作者認為，西域各國的使節頻繁出入長安，他們瞄着絲綢而來，滿載絲綢而歸，十九世紀普魯土地質學家李希霍芬把東西商貿通道命名為“絲綢之路”，是十分貼切的。然而，日本、朝鮮甚至越南的遣唐使，他們主要是瞄着書籍而來的，甚至舍棄絲綢購買書籍而歸，那麼東亞各國之間的通道，應該稱“書籍之路”才對。“絲路”與“書路”呈現出全然不同的文明景觀，中國通往西方的是“絲路”，穿越廣袤的沙漠，駱駝運載的是絲綢；中國連接東亞各國的是“書路”，跨越浩瀚的大海，舟船運載的是書籍。

“絲路”與“書路”不僅地域不同、傳播工具不同、流通內容不同，更重要的是文明內核與生命機制截然不同。古代曾經大批量、持續性輸往西域的絲綢，現在即便從深埋沙漠的遺存中出土，大概也已經腐朽而不堪穿用；然而，當年遣唐使攜歸的書籍，直到今天依然是人們智慧的源泉。

提到文化的源頭與中心時，作者以自己獨特的視角解釋道，東亞文化疆域的源頭在中國，我們已經說的很清楚了。那麼，這個文化疆域的中心，是否也在中國呢？如果光看唐朝 300 年，那是毋庸置疑的；倘若回眸千餘年，這話就不能說死。因為對一個文化疆域來說，源頭是與生俱來的、恒古不變的、獨一無二的，然而中心則是後天造就的、應時變遷的、可以多個中心並存的。文化疆域的中心，未必永遠定格在源頭，往往在“吞吐”現象最活躍的地區凝聚成中心。

## 四、文化的環流——“吞與吐”

這本書提出“文化環流”概念，突破以往的“文化交流史”研究方法，從文化源頭之中國出發，視野所及涵蓋朝鮮、日本以及琉球、越南等地，強調文化並非“點”對“點”的直線傳播，而是在文明生態互不相同的區域呈現迂回曲折的傳播路線；重視中國文化在傳播過程中不斷吸納異文化因子，促使自身的不斷完善與持續進化。作者把這種文化運動方式歸納為“吞”與“吐”，動態觀之便是“文化環流”形態。

作者認為，評價一個國家文化實力的標準，原創了多少文化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看文化的活力。以海納百川之勢吸收周邊國家的文化，這是“吞”；以天下無私之心輸出文化，這是“吐”。

在“域外書籍的回流”章節中，作者指出，此“書籍之路”並不是單向流播的，東亞諸國的漢文書籍也沿着同一條“書籍之路”逆向輸入到中國。扮演逆向輸入主角的不是別人，正是那些在唐購求書籍的遣唐使們。在此，作者析出了“環流”理論中“逆向”這一重要環節，將文化的回流命名為“逆向輸入”，並肯定了遣唐人員在漢籍傳播與回流過程中無以替代的關鍵作用。而透析此類文化傳播的現象與模式，作者將其命名為“回流”，可謂獨具哲理與韻味。

遣唐使遠途涉海而來為求書籍，曾幾何時，漢籍在域外的東亞各地生根發芽，而後又回流至其起點的中國。作者提到，日本從“吞”下中國文化後，進入漫長的模仿、咀嚼、取捨、消化的階段，比如他們精心保管中國傳去的唐寫本，並且大量傳抄甚至注疏；再如依據本國的國情吸收密教的諸多元素，從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祖庭危急之時，任命天臺僧日延為“繕寫法門度送之使”，謄抄 500 多卷天臺典

籍送回中國，可謂“雪中送炭”。

從“吞進”到“消化”再到“吐出”，這個過程一氣呵成，終於在某個時段把日本推上了“中心”的寶座。天臺宗的源頭—天臺山與國清寺，被東亞各國尊為“聖地”與“祖庭”，這是祖先留給我們的遺產，自然應該珍惜呵護；然而要確保“中心”的地位，唐朝“氣吞山河”的氣概、“日月無私”的胸襟值得我們學習，日本人的繼承與創新也值得我們借鑒。

需強調的是，文化的回流並非單純意義上的逆向輸入，輸入國在吸取中國文化的同時融入了本民族的智慧與心血，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具有該民族特征的混血文化。而這種文化又在某一時間，通過某種方式回流至其源頭。回流至中國的這些文化要素不僅體現了接受方對漢文化的解讀與創造，也詮釋了東亞區域文明的存在形式與特征。

該書分析了大唐能夠推動東亞文化環流的“吞吐力”，亦即“文化的活力”，一個民族在文化上，無論是吞還是吐，都能激發創造的活力。“環流”不僅局限於“書籍”這一古代東亞文明交流的主旋律，而是人員往來、文化傳播、物資循環等諸多層面交流過程中的實際運作狀態。這就揭示了古代東亞文化交流的規律、方式與特征，為東亞區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並將廣泛運用於東亞人文學領域的諸多層面。

作者強調，文化的輸出，不僅僅是施舍；文化的攝取，也不僅僅是領受。雙向的、甚至是多向的交流，才能使一種優秀的文化獲得永生。這便是我們在尋繹書籍之路過程中，獲得的最深的感悟。無疑，人員在肩負文化交流重任的同時也兼具了文化載體的功用，其流動與交融也必將帶動文化的“環流”。

本書提出了以下重要觀點：文化疆域的源頭與中心，是一個民族、

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集中體現。這種文化軟實力，在建構未來新型國際秩序之際，與軍事力、經濟力相比，具有更強的穿透力與親和力、可塑性與持續性。“源頭”是需要我們去繼承、呵護的，“中心”是需要我們去激活、爭取的。如果我們高枕無憂、掉以輕心，不僅會退出“中心”，甚至有可能連“源頭”也會枯竭。

